

# 通往「總裁」之路： 蔣介石日記中的黨務記事及其心境自剖（1926-1938）

王良卿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自總理孫中山逝世後，其黨政體制呈現委員合議的形式化格局，但實際上依形勢發展，仍有個別領袖人物突出、居於領導重心，例如汪精衛在後孫時期的廣州、武漢階段，就扮演了這樣的一個角色。及至清黨以後的南京，逐漸成為蔣介石大致籠罩的局面，其自承「大小各事皆須親理」，黨內異議陣營則指控他遂行「個人獨裁」，話語雖然各具立場，總能說明蔣居於籠罩之實的梗概。<sup>1</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黨務領域，縱使蔣介石取得優勢的支配與籠罩能力，然在南京十年的絕大部分時間，他的黨部職銜只能落在委員合議的班列之中，其權力行使一直存在「名實未副」的困境，始終懷有不同於政務領域的焦慮（儘管政務領域同樣呈現了以蔣為中心的「權隨人轉」而未必名實相副的實質特徵）。<sup>2</sup>我們看到，直到北伐底定後三年，蔣還認為國民黨只算是得到政權之「空命」而已，猶須致力培養革命基礎，

1 「皆須親理」，見：「蔣介石日記」，1930年12月2日，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

2 在南京十年的大多數時候，蔣的黨務基本職銜是中央執行委員（雖然從第三屆中執會時期開始，均排名第一，但在形式地位上，和其他中委並無上下之分）。其間，兩度受推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然任期均短。

方能濟。<sup>3</sup>這裡所說的「空命」，顯然是指尚未落實的天命，亦即國民黨雖有統治全國之實，然「合法性」(legitimacy)仍有不足，而應設法填實之警覺。引而申之，蔣自承「皆須親理」諸事之餘，猶自認「年輕資淺之身」、「威信不足」，以致「人人來侮」，「非自強豈能成業」云云，恐怕一樣具有「空命」的自況、自惕的意味。<sup>4</sup>

本文運用蔣介石日記為主的一手材料，探討蔣介石自1926年積極過問黨內事務後，支配能力日升，然苦於名實未洽而纏磨有年，直到1938年成爲全黨唯一最高領袖，終而名實勘合的一頁過程。其中，根據主要材料的特質，特別著重蔣追尋黨內統治合法性時的心境自剖，及與時代局勢的互動。一般而言，學者習慣從權力鬥爭的角度，考察蔣邁向人身最高統治地位的進程。這種研究角度可以提供某些符合線性史實的基本輪廓，滿足讀者的認識，但也可能流於蔣不貳領袖身分之形成只是「以力服人」所致的解釋。其實，如果我們能另行補充一個實權者設法追尋黨內支配合法性的觀察面向，當能體會到蔣在通往國民黨不貳領袖地位的道路上，仍須同時面對另一種艱難形式的挑戰，亦即如何超克某些橫梗在其統治合法性前的障礙因素，取得被治者的認可與服從，俾自黨務支配的「名實未副」當中脫困。<sup>5</sup>從這個角度進行再省視，我們也才有機會更能完整理解這位民國上層人物做爲一個權力征服者背後依然倍感焦慮的幽微情結，及其名實有別的權力施作在國民黨內所可能伴生的制度、人事動態的變化，以及擁蔣陣營在中國全面抗戰之前一再鼓吹再造

3 「蔣介石日記」，1931年5月20日：「上午到黨部與各省黨委談話，以此時革命環境，祇可視爲本黨得到政權之空命而實行宣傳革命工作、培養革命基礎之時代，非可視爲革命完成之時代也。」

4 「蔣介石日記」，1928年6月25日、7月28日、1930年1月8日。

5 這裡的「合法性」，自非「合法的」(legitimate)之謂，更非「力」的震懾所能輕易證成。它指涉的是統治權力能否獲得被治者的認可與服從，往往要透過個人贊同、集體價值規範、法律規則等多重面向，取得協調性的認知與行動，才能得到較好的證明。參見：讓馬克·奎克(Jean-Marc Coicaud)著，佟心平、王遠飛譯，《合法性與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中譯本序文，以及原著引言、第一章。

黨魁的行爲邏輯。

## 二、蔣「親理」諸事的「空命」心理

清黨以後「南京十年」的國民黨政治，實際上是蔣介石籠罩的局面。不過蔣在黨務領域的支配一直存在著名實未能相副的焦慮，大抵即其「空命」所謂，恰正說明這位黨事支配者的權力行使，常帶有合法性不足的警覺。其原因，部分來自其軍權之擅場終究虧負於黨治之理想，部分則來自委員合議形式下之黨內元老的環伺與羈絆。

### （一）誓言今後斷不至有「新軍閥」產生

蔣介石的「空命」認知，首先是因爲其軍事強人身分處在黨治形式理想下的尷尬。換言之，軍權愈爲之擅場，終究愈虧於黨治旨趣之發揚。

在1920年代前期廣州的國民黨人事系譜中，蔣介石原本是以一介軍人的身分，建立起一己的安身立命與影響力。國民黨改組後，他和許多同志都必須在此「革命之再起」的嶄新政治宏業的理想形式及動態實踐當中，拿自己本業的起家身分，重新學習和這個（新）黨之間的對應關係。特別是國民黨重新省視了既往「軍人持權，黨員無力，故黨之主張無力」、黨「爲兵所制」的斑斑淚史，又自俄共方面挪借了「以黨領軍」的觀念與方法，在這當中，蔣介石等高級軍人的肆應心理爲何，頗堪吾人探究。

改組措施正式啓動之前，蔣介石率團訪問蘇聯，對紅軍「必由其黨首負責躬先」的特點已具認識。<sup>6</sup>其後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對於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事業中的制高地位不吝反覆致意，強調黨是軍隊的靈魂，指軍

6 呂芳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一九二〇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爲例的討論〉，收入呂芳上著，《民國史論》，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42-43。

隊黨代表制是「救濟中國現在軍隊惟一的制度」，其話語之清晰無礙，似能深諳國民黨改組精神以黨作為無上權威的新穎底蘊。<sup>7</sup>但另一方面，這位軍事要人的認知一旦落實到操作層面，則又往往未必略無泥滯。例如1925年1月，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各級黨代表在東征首途之前，必欲確定該一職位的權責範圍，甚至決議「赴省要求廖校黨代表」曉示見解，然蔣介石「令其回校痛斥，辯論是非」，事後糾紛猶未緩解，「心又不樂也」。<sup>8</sup>4月，黨的中執會例會通過廖仲愷提議，以教導團一、二兩團成立黨軍第一旅，仍歸校長蔣介石節制調遣，其後中央任命廖擔任黨軍之黨代表，<sup>9</sup>但蔣在日記直指廖的舉動係「有意防範，撤我之權。我但望其自不叛黨，而不配防範介石也」。<sup>10</sup>儘管這當中涉及跨黨黨員的人事、意識隔膜，但多少仍顯示蔣和此一系列寧式政黨性質的監軍模式仍在磨合之中。

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恐怕是首次而且全面的，將蔣介石這位軍事強人直接推送到過問黨事的最前列。5月，國民黨舉行二屆二中全会，通過整理黨務諸案。這場會議攸關國共合作關係走向，以及蔣此後跨領域的權力鵲起，惟其雖然居於主導會議、提案的關鍵角色，但仍全力避免留給人們「以軍問黨」、「武主文從」的浮想。22日，全會閉幕，蔣解釋議案並致詞，即特別補充聲明：本次請求召集全會，「完全是以黨員的資格來建議的，決不是以軍人的資格要來解決黨內的糾紛」，「外面或許有人不明白，以為此次提出整理黨務案的是一個有實力的軍人，如果這樣想，就完全錯了」。<sup>11</sup>當天日記又表示自己是「以黨員資格整理

7 蔣中正，〈帶兵辦事與用人的要訣〉（1924年12月16日），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144。

8 「蔣介石日記」，1925年1月20、22日。

9 「第七十三次會議」（1925年4月6日），〈一屆中執會第61-110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1.3/19.3。

10 「蔣介石日記」，1925年5月10日。

11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1887-1926）》（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頁521，1926年5月22日繫事。

黨務，而非以軍人干涉黨事也」。<sup>12</sup>

這年夏天，經由二中全會的人事安排以及配合北伐軍事動員所祭出的各項措施，蔣介石的權力迅速膨脹，橫跨黨政軍領域，也呈現了集中化的傾向。很快的，西方媒體評論這位政治新星「表現出一個征服者統領一切的氣勢」。<sup>13</sup>但在國民黨內治絲益棼的政治動態下，蔣的權力猛晉與集中化，顯然並未獲得全體同志的一致認同。特別在左派與跨黨分子陣營，一開始就用了相左的口吻，先是暗諷他「有點仗著那兩根槍的樣子」，「我們覺得總不大妥」、「於黨的原則上總不大對」，<sup>14</sup>繼而直接指控「此勢力之鋒」「現不可當」的人物正在遂行「個人軍事獨裁」，爰是揭櫫「提高黨權」口號以壓抑之，從而形成蔣的莫大苦惱，只能不憚其煩的提醒，自己的身分還原到最後，其實就是一位忠實「黨員」而已。<sup>15</sup>例如1927年2月，武漢方面的排蔣風潮趨於熾烈，蔣介石悲嘆「黨國其亡」，惟亦自辯：「防制獨裁制我甚贊成，但CP跨黨使真正黨員對黨不能信仰，何余欲及時擺脫而又不得，苦甚。」<sup>16</sup>及至南京方面與共黨決裂，「擁蔣」口號聲熾，幾乎與「清黨」並轡，蔣雖認為「領袖是事實上不可廢的」，卻也不忘表示「擁護黨」才是國民革命的第一義，「大家有推愛到中正的地方，也祇是因為中正，是忠實的黨員之一，盡力為主義去奮鬥，這是中正個人的責任和本分。」<sup>17</sup>

國民黨改組後，對外曾揚言反對「專制餘孽之軍閥」，其欲澄清國

12 「蔣介石日記」，1926年5月22日。

13 王良卿，〈美國報刊裡的“Chiang Kai-shek”——對於Time, Life與The New York Times的基本調查〉，收入黃克武主編，《海外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年），頁110。

14 〈上大總務韓覺民報告廣東政局〉（1926年6月15日），收入陳紅民輯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476。

15 「現不可當」：徐謙語。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第二次會議錄」（1926年10月16日），《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2.0/4.3。

16 「蔣介石日記」，1927年2月17-18日。

17 蔣中正，〈擁護黨與擁護個人之區別〉，收入郎醒石編，《革命與反革命》（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頁357-358。

內武人政治之壯懷激烈，顯而易見，而實際上，軍人割據的傳統仍非一時乃至北伐所能澈底克服；<sup>18</sup>對內則透過「黨指揮槍」的嶄新治術，力圖建立某種「文主武從」的黨治邏輯，然而在實務表現上，文武孰主孰從，時人多有不同想像。據此，蔣介石在黨內的迅速崛起，乃至成爲西方觀察家眼中的「征服者」，其最需面對的，恐怕正是某些國人直接視武人政治爲國族退化表徵的心理，以及若干黨人所謂「軍權壓倒黨權」的深切疑慮。1928年7月，時值國民革命軍開入北京閱月，蔣介石前往北京大學演講二日。這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這所引領國內近代思潮的高等學府，既談到廢除不平等條約與統一思想之必要，也坦承自己的軍人身分或將引起大家對於國家前途的疑慮云云。談次，充分反映了他是如何受到外界以軍權秉政爲退化、爲霸府等等情緒意識的纏磨而思以自清的幽微心理，正表示了其明白後北洋軍閥時期再以軍權治國的合法性不足。他說：

我是軍人，或許引起各位兩種感想：一種是說蔣介石現在將要成爲一個新軍閥；一種是說蔣介石將要創造一個新軍國主義。這是錯誤的！不僅我個人可以明白立誓，確切自信；即以進化史上講，我中華民族亦斷不至有新軍國主義和新軍閥產生！否則必是天亡中華！<sup>19</sup>

這時在國民黨內，左派與跨黨分子前曾抨擊「軍權」獨擅的言論並未隨著清黨、北伐完成而真正告終；某種角度而言，黨內各路反蔣勢力承繼了這些聲音，並揭櫫「護黨救國」口號（這與南京方面執行清黨反共時的口號同出一轍），衍爲歷次的武裝反蔣運動。儘管蔣介石總是

18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年1月31日），收入蕭繼宗主編，《中國國民黨宣言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年），頁89。

19 「困勉記」，1928年7月18日繫事，〈困勉記初稿（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60200-00002-003。參見「蔣介石日記」，1928年7月17-18日。

將自己化約為一位服膺主義和黨的忠實黨員，主動進行自我身分的再標識，並採取積極的自我辯護態度，但效果仍然有限。其實，就蔣的私密心理而言，常以軍人身分自傲於其他文人，然其儘管「自緣身在最高層」，但對於自己以軍事起家的身分以治黨，恐仍欠缺「不畏浮雲遮望眼」的信心。1929年歲杪，蔣面對改組派和實力派軍人的異動，認為自己蒙受「窮兵贖【贖】武、把持黨權、野心專橫」之詬，一度尋念「自矢辭職，以為軍人模範」，否則「謠誣終不能息」。<sup>20</sup>辭職之說，證諸當時事實，並未成真，不過蔣的感慨係之，恐怕也正顯示了這位上層軍人對於黨局面下的權力行使界線到底在哪裡，亦即統治合法性的節點上，不無焦慮之感。

## （二）「年輕資淺之身」的「悶損不堪」

觀察蔣介石日記在南京十年的黨務記事，常能看到類似「權高命空」等自傷心態的流露。除了前述黨治的理想與規模可能給一位志在青雲的軍事強人帶來潛在的制約效果之外，一方面也是來自於黨內元老倚靠革命資歷與委員合議制度用以自壯，所帶給蔣的羈絆作用。<sup>21</sup>

國民黨改組後的「黨權」話語在孫中山逝世後漸有頻繁出現的走勢，武漢排蔣風潮期間的運用之勤，尤為浩浩湯湯。基本上，這個名詞指的是一個列寧式政黨的支配性權力，其行使的主體在後孫時代經常被認為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黨總章所明定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機關），及其委員合議機制所涵攝的集體領導精神。在黨內，它形成了權力名義行使的緊箍，亦即決策合法性，正如蔣介石必須透過一場二中全會才能貫徹其整理黨務的決心和爭取更高階的黨內職

20 「蔣介石日記」，1929年12月29日。

21 學者王奇生〈蔣介石與黨國元老（1925-1932）〉一文談論黨內元老在後孫時代的角色，頗有可觀。收入黃自進、潘光哲主編，《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 第一冊：領袖的淬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頁429-468。

位；同樣的，1927年3月，武漢政權也必須藉由一場三中全會才能剝奪蔣的多項要職，以遂行「提高黨權」而削蔣的企圖。尤有甚者，蔣在4月發起帶有反擊意味的清黨行動中，同樣必須取得一批中央執行、監察委員的支持與背書，才能創造南京集團統治的正當性格。

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初期，經歷清黨、分共、寧漢滬三方的合而不流，黨爭依然不斷。這時，蔣介石與聞黨事，例必訪顧、問問人稱「商山四皓」（李石曾、張靜江、蔡元培、吳稚暉）的意思，狀極尊重。事實上，李張蔡吳等員，人稱「彷彿代表一種道德的勢力」，正是蔣介石賴以執行清黨、開府的有力支柱，其黨內元老加上委員要席（中監委）的多重身分，本身就是證成南京政權不可或缺的存在。<sup>22</sup>但在蔣介石的日常私密書寫中，常說這些老者「徒尚意氣，而不顧黨之存亡」、<sup>23</sup>「主觀太深，不適現代政治」、<sup>24</sup>「固執與怕共，幾乎失其常態」，<sup>25</sup>形成蔣日記所謂「白虫」之喻，且拿來和「紅蟻」（左派）並立，成爲其眼中「皆來侮辱」的黨內紛歧生態。<sup>26</sup>

這時的蔣介石日記，經常留給讀者一位黨內實力派秉持務實原則而問事，卻動輒兩難周全的印象。日記一再強調蔣處理黨內人事問題的躊躇與苦衷，反而並不怎麼寫到自己對於黨內路線之爭的定見。例如1928年2月的二屆四中全會是決定黨內隊伍自去年清黨以後再次清洗的重要集會，「多認爲非開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不能解決全黨的問題」。<sup>27</sup>會中通過了整理各地黨務決議案，一般認爲是伸張了蔣介石的個人意志，具體影響了以後數年南京中央憑藉「黨務整理運動」名義而反覆汰洗地

22 道德勢力：羅家倫口述，馬偉筆記，〈商山四皓〉（1931年6月30日），羅久芳、羅久蓉編輯校註，《羅家倫先生文存補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頁28。

23 「蔣介石日記」，1927年12月9日。

24 「蔣介石日記」，1928年1月21日。

25 「蔣介石日記」，1928年2月6日。

26 「蔣介石日記」，1928年7月28日。

27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紀錄》（南京：中央日報社，1928年），頁13。

方黨部人事的艱鉅工程；<sup>28</sup>不過蔣日記對此著墨不多，反而再三書寫的是全會「新舊二壁壘森嚴，爭執異甚烈」，<sup>29</sup>特別對於常務委員人選，一直圍繞著「汪胡二人應選與否」的問題而紛呶不休：蔣自謂白虫「防共產之嚴太過」，紅蟻雖「亦防共而手段不同」，然「皆對余懷疑不滿」，李石曾、張靜江甚至警告「如自由選舉，則監察委員必退席反對也」，<sup>30</sup>直令蔣大有「悶損不堪」之嘆。<sup>31</sup>最後，蔣記道：全會幕後「決定以先選五人而留四人為後來汪胡回國缺額，費辭甚久，卒能通過。此案既定，則難關已過。第四次全體之開成與其解決之圓滿，殊非總理在天之靈所感應不能辦到也」。<sup>32</sup>

在黨內元老加上委員合議制度的混成格局中，即令蔣介石的權力有所上升，而其念茲在茲的，猶是己身操持黨務之合法性的不足，以致時時帶有瞻顧、妥協之感。在南京中央方面，雖然像元老派吳稚暉這樣的人物能與蔣介石保持著親善合作關係，但其方寸之間，卻也曾經認為蔣以後進之姿，雖自中山艦事件後「亦有幾分」「代表黨」的資格，惟在歷史、人望等條件上，總是稍遜胡汪，「乃並不是天經地義」。<sup>33</sup>其實蔣的日記也反映了自己非常清楚這種「天經」與「地義」俱短的困境。例如他生平首次發表一場中央全會開幕式的「開會詞」，就在二屆四中全會，當天不僅自記「甚覺慚惶」，也在講演內容特別突出中央委員的法理權力，強調應以中央委員會領導所有的武裝、非武裝同志，以便完成國民革命

28 王克文，〈北伐後國民黨之黨務整理〉，收入王克文著，《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臺北：國史館，2001年），頁55-183。

29 「蔣介石日記」，1928年2月3日。

30 「蔣介石日記」，1928年2月4日。

31 「蔣介石日記」，1928年2月5日。

32 「蔣介石日記」，1928年2月7日。

33 1927年清黨後，吳稚暉私告胡漢民曰：「中山先生身後可以代表黨者，止有先生及精衛。去年三月以來，介石亦有幾分這種資格，乃並不是天經地義……。」〈吳稚暉致胡漢民函〉（1927年），收入陳紅民輯注，《胡漢民未刊往來函電稿》，第1冊，頁462-463。

云云。觀其言，似乎頗為技術。<sup>34</sup> 1929年6月，三屆二中全會閉幕後，自記：「黨部宴會，正位無人坐，甚感黨部無人主持之難也。余以後生而任要職（按：指國民政府主席），行動言論無在不受人注意與指摘也。」<sup>35</sup> 又，1928、1931年，蔣兩度受推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然任期均不過數月（適與同時期連續擔任三年多的國府主席形成鮮明對比），曾記道：「以年輕資淺之身而權位反在老成者之上，總理在日尚難應付，無怪陸榮廷、陳炯明之不絕也。吾惟行其正道，不與內爭，以待時局之轉而已。」<sup>36</sup> 又記道：以後「事非公開廣益不為功也」。<sup>37</sup>

要「公開廣益」，這就是在政治倫理上去尊重老者的存在，在權力體制上去適應委員合議形式的繼續磨折。這時蔣介石日記的黨務記事，經常呈現半點不由己的無奈感，其實所言恐非完全如是。例如一批老者的政治立場往往未必和蔣的衷心相違和，只是某些過激的堅持倒可能藉由其體制身分的加持，妨礙了蔣的權宜運用罷了。1928年夏秋之際，南京中央伸往地方的黨務整理運動具體展開，反而促成汪派勢力以「改組派」為名進行盤整集結，掀起波瀾甚鉅。吳稚暉、李石曾向蔣介石表明「欲從新清黨，否則不行」的態度，白崇禧甚至「聲言祇求清黨，雖推總司令稱帝亦所願意」。<sup>38</sup> 蔣同樣厭惡改組派諸人，但仍記道：「余嘗思救黨為惟一責任，無黨不能革命，亦無今日之我也。彼老同志輒指左派為共產黨，必欲一網打盡以快其心，不知其對於以後之黨應如何處理，不思究竟與是非，而徒重利害並逼人為劊子手，是何可也。」<sup>39</sup>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蔣介石明白「反動派對余以窮兵贖【贖】武、

34 「蔣介石日記」，1928年2月2日；「開會詞」（1928年2月2日），收入榮孟源主編，孫彩霞編輯，《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年），頁507。

35 「蔣介石日記」，1929年6月18日。

36 「蔣介石日記」，1928年3月7日。

37 「蔣介石日記」，1928年6月25日。

38 「蔣介石日記」，1928年8月3日。

39 「蔣介石日記」，1928年8月27日。

把持黨權、野心專橫之謠誣終不能息」，但其日記也經常自辯「不知政治之滋味者以余為高人一等，實則處處受辱，人人來侮，誠忝我所生而已」。<sup>40</sup>日記先是充斥著代替黨內老者受過的語態，接著在「蔣胡合作」局面下，始終讓他覺得「悶損不堪」又是一例。蔣一直認為國民黨內普遍存在「無粵人汪胡即不成黨」的「奇言」、「封建思想」，<sup>41</sup>但他自己在「威信不足，無以行令」<sup>42</sup>的客觀態勢下，卻也難脫此一主觀「奇言」的制約，必須在整個南京十年視時勢需要而「聯胡」或「聯汪」以「成黨」。不過，1928年確立的「蔣胡合作」路線維持沒有多久，蔣介石日記又已流露「悶損」的況味，曾自謂「大小各事皆須親理而用人提議又不能自主，皆受掣肘」、<sup>43</sup>「胡專欲人為其傀儡」，<sup>44</sup>其中的根本癥結在於蔣介石認為胡漢民以其特殊資歷地位自視正統，「以『司大令』自居」，<sup>45</sup>並托寄在黨內元老加委員要席的混成格局中，「借委員制之名而把持一切，逼人強從」，<sup>46</sup>幾乎使蔣覺得動輒受限，而寧願相信「政府不安」、「黨部內訌」的「總因」恰恰在於「彼」，以致「吾人不察，竟上其當且受不白之冤……使我成為怨受」。<sup>47</sup>

蔣介石日記經常憂慮黨務的「不統一」，實則泰半講的是人事派別的紛歧問題，所謂「黨事無辦法，則一切皆無辦法」，而事實上，他認為軍政皆可談，「惟黨為無辦法也」。<sup>48</sup>蔣介石當然以統一黨務為己任，即

40 「蔣介石日記」，1930年1月8日。

41 「蔣介石日記」，1931年6月19日。學者金以林談國民黨的地域觀念與蔣介石的起伏，尤其著重「粵籍領袖正統意識」的討論。詳見金以林，《國民黨高層的派系政治：蔣介石「最高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417-439。

42 「蔣介石日記」，1928年7月28日。

43 「蔣介石日記」，1930年12月2日。

44 「蔣介石日記」，1931年2月10日。

45 「蔣介石日記」，1931年2月15日。

46 「蔣介石日記」，1931年2月13日。

47 「蔣介石日記」，1931年2月14日。

48 「蔣介石日記」，1928年3月30日、6月11日、6月16日。

使在委員合議的框架下，日記也曾一度想過貫徹己是，將不同的意見視為「反動」，而有「不顧」之決心；<sup>49</sup>然而1931年蔣胡決裂前，蔣介石又一度想到胡漢民慣以「軍人而不知政治」相譏，反而又覺得要回應以黨內民主措施，「各省黨部選舉絕對自由，不再圈定，而一切議案亦絕對公開」，才能杜絕悠悠之口，「此方足以平亂」。<sup>50</sup>某種角度而言，同年2月「湯山事件」之扣胡，恰是蔣的「不顧」心態強壓過「民主」浮想的猛爆表現。<sup>51</sup>這位自矢為「軍人模範」<sup>52</sup>的強者終究為此付出了寧粵長期分裂的代價，顯示了其雖有統一黨務之心，可並非全盤皆能著力，更顯示了一位軍事強人在黨治規模、委員合議體制之下而積極問黨的進退失據。5月，蔣介石與各省黨委談話，勉以「此時革命環境，祇可視為本黨得到政權之空命而實行宣傳革命工作、培養革命基礎之時代，非可視為革命完成之時代也」。<sup>53</sup>事實上，這時蔣介石與聞黨事的權力合法性尚未充分證成，如果拿這種政權空命之說類比他在黨內領導的處境，代以「得到黨權之空命」之句，似乎也很恰當。

### 三、「吾獨當其衝」：思以「鐵血危死」形成「新黨基礎」

1931年12月，蔣介石經歷個人政治生涯的第二次下野。他對於這次重大挫折的總結反省，有所謂「今次革命失敗是由於余不能自主。始誤於老者，……再誤於本黨之歷史，允納胡漢民孫科，一意遷就，乃至於不可收拾」、「反共以後，吾獨當其衝，而乃不學無術，一任所謂元老

49 「蔣介石日記」，1928年3月14日。

50 「蔣介石日記」，1931年2月15日。

51 蔣介石扣胡後，覆電張繼，說明黨員與官吏無自由之理：「吾輩如言自由，則人民與黨國無自由矣。余寧蒙負友之惡名，而不願避此惡名以負我黨國也。」見「蔣介石日記」，1931年3月7日。

52 「蔣介石日記」，1929年12月29日。

53 「蔣介石日記」，1931年5月20日。

先進之擺布，……一意遷就昔日之朽汙」等句。蔣既自承「獨當」要津，反又慨歎「不能自主」、「誤於老者」、「誤於本黨之歷史」云云，其感觸之由，正是建立在前述「空命」的認知心理而有以致之。<sup>54</sup>

根據日記判讀，蔣介石渴望掌握黨務、擺脫「空命」地位等念頭，是和他有意改造國民黨一事同步想像的。1932年2月，蔣曾與賀衷寒等人「談組織少年黨事」，<sup>55</sup>其畀予黃埔嫡系子弟以「少年」頡頏「老者」、「先進」、「朽汙」的厚望不言可喻。這裡所謂的少年「黨」，指涉的恐非政黨，而應是某種政治組織的集合體之意。學者經常引用這時蔣介石日記「無幹部無組織無情報，……乃致陷於內外挾攻之境，此皆無人之所致也」的自嘆，其實蔣認為其軍事幹部尚有若干「後進者」可供輔翼，但「黨務之幹部實一無其人」。<sup>56</sup>在國民黨改組以後的運轉文化中，「小組織」總是被申令禁絕的一種負面表徵，但實際上又總是被各路國民黨人視為一種政治資本而愛不忍釋，蔣亦作如是觀。<sup>57</sup>很快的，蔣介石和黃埔早期學生對於「少年黨」的討論，就給落實成爲了力行社的金字塔型組織體系，其後並連同另一支由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銜命組建的青白團體系，共同充當起蔣所謂「從頭做起，期以十五年工夫，或有收之桑榆之一日」<sup>58</sup>的嶄新人事基盤。一方面，就蔣的私動機而言，此舉帶有增益自身領導基礎的思考，近於「派系替代」的作法，以新替舊、以親代疏，是一種利己的嘗試；另一方面就公動機而言，當然也是盱衡國民黨黨勢之老邁，近於醫學的代償作用，希望透過黨內人事基礎的代際翻轉，振黨起敝。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力行社組成前夕，蔣介石曾與戴季陶深談，儘管戴對於這種透過人事翻轉「以改組本黨」的作法期期以爲「不

54 「蔣介石日記」，1931年12月24日、1933年9月26日。

55 「蔣介石日記」，1932年2月15日。

56 「蔣介石日記」，1931年12月24日。

57 「蔣介石日記」，1927年2月28日：「非自身訓練久交之團員決不可作爲團體也。」所謂「團體」，即小組織之意。

58 「蔣介石日記」，1933年9月26日。

可」，但顯然並未動搖蔣的決心。<sup>59</sup>

就在1932年春夏，蔣介石開始看情報學、各國情報活動內幕等書籍，定情報組織法、與親信談情報事，並且把鍛造親信幹部、祕密小組組織與情報事業等三件事混同起來，看成利己振黨的同一件大事業。例如：「組織政黨，澈底革命，必先組織偵探隊防止內部叛亂，制裁一切反動，監督黨員腐化，宣傳領袖主張，強制社會執行，此偵探隊之任務」、<sup>60</sup>「晚與賀康等生談組織事，必欲組織一祕密奮鬥、人盡其才、控置全國之機關，方得完成革命。如僅普通組織，則必腐化消滅也」。<sup>61</sup>繼1929年閱讀墨索里尼傳記並推許其「所以成功」後，<sup>62</sup>這時蔣介石也開始閱讀俾斯麥傳，並嘗試將近代德意志國家脈絡的「鐵血」精神輸入到中國政治，曾自記：「反動之力甚大，非鐵血不能解決」、<sup>63</sup>「疲弱之國，惟鐵與血、危與死四字，乃能解決一切也」。<sup>64</sup>

不令人意外的，人們開始臆測蔣介石是否有意在中國推行歐陸時興的法西斯運動，但蔣非常明白這個可資借鏡的外來思潮並不能在國民革命的黨治規模下，扛負起名正言順的指導地位，所以其回覆《大公報》電詢法西斯組織之有無時，就說道：「中正生為中國國民黨之黨員，死為中國國民黨之黨魂。祇知中國革命的組織惟有一個中國國民黨之組織，而中國革命的方式亦惟有一個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的方式為中國革命惟一無二的途徑。……中正今日唯一之志願乃在復興中國國民黨十三年之革命精神與其獨一無二國民革命之組織和方式，而以任實現三民主義自任也。」<sup>65</sup>又自記：「中國國民黨以主義治天下，自信其主義與國家必

59 「蔣介石日記」，1932年2月27日。

60 「蔣介石日記」，1932年2月17日。

61 「蔣介石日記」，1932年2月21日。賀：賀衷寒。康：康澤。

62 「蔣介石日記」，1929年4月13日。

63 「蔣介石日記」，1932年3月2日。

64 「蔣介石日記」，1932年4月20日。

65 「蔣致胡政之張季鸞電」(1932年7月10日)，〈領袖指示補編(九)〉，《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

能永存於世界，豈僅周朝八百年之天下而已哉。」<sup>66</sup>也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指出蔣介石在這時候就已打算另起爐灶成立一個旨在取代國民黨的新黨組織，就像親胡漢民陣營的刊物所指控的「現在軍事獨裁已舍棄中國國民黨了，他已經另有法西斯蒂式藍衣社的組織了」云云。<sup>67</sup>事實上，蔣真正念茲在茲、須臾未忘的，還是如何透過他的「派系替代」工程以成就國民黨人事基盤朝向自己的嶄新翻轉，如1932年11月自記：「與立夫談黨事。如明年不能形成新黨基礎，則再過三年，余年五十，救國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令努力進行也。」<sup>68</sup>

#### 四、以「降尊就屈」換取「瓦全」： 在五全大會的改制風潮中「慎之又慎」

1930年代前期，國民黨除了呈現以蔣介石為中心的人事翻轉走勢之外，擁蔣陣營也因勢利便的托庇了舉國救亡圖存的集體意識，積極營造輿論，針對蔣介石幾年以來掌握黨權所面對的幾個合法性不足的因素，提出了林林總總的翻轉性論述。其中最顯要者：一、在日本節節進逼的情勢下，把蔣的軍人身分及其豐碑般的軍事資歷，闡釋為領導「黨國」的不貳條件；<sup>69</sup>同時在法西斯救國的領袖集權、獨裁論潮中，將以往蔣蒙受的「獨裁」負面指涉，倏地翻轉為正面價值的想像。二、在振黨起敝、迅赴事機的呼聲中，再三批判黨中央現行的委員合議制度，歷數其大有礙於決策效能、責任歸屬、黨的團結等，籲請改弦易轍，恢復黨已

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90106-00009-170。並見「蔣介石日記」，1932年7月9日。

66 「蔣介石日記」，1934年5月31日。

67 〈發刊詞〉，《力行月刊》，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頁5。

68 「蔣介石日記」，1932年11月30日。

69 學者也觀察到：學界經常忽略「政治負面攻擊」在蔣介石通往唯一領袖之路上所產生的某種不自期的「貢獻」效果。例如「九一八」後的數年間，激憤的知識分子愈以「不抵抗」的罪名冠諸蔣，事實上，蔣作為引領民族禦侮的領頭身分也就愈在話語的辯證層次上顯得無可爭論。詳見：王良卿，《改造的誕生》（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頁67。

懸置多年的領袖制度，或稱總理，或稱總裁，賦予「文武兼賅、偉大崇高」而堪當此任者以全權。<sup>70</sup>一位出身黃埔的國民黨員自行刊印小冊，直陳「目前黨國的幾個基本問題」，主張建立領袖集權制度，說的最為直接了當：「在目前內外夾攻的中國，斷非一個白面書生的宰相所能擔當，也非多而不專的委員制所能為力，惟有文武兼全，在國民革命具有歷史者，才能勝任。」<sup>71</sup>

除了顯而易見的軍事背景外，其實蔣介石在國民革命的黨務活動這一塊，是否充分「具有歷史」，尚是一個言人人殊的問題。但委員合議制度見責於領袖集權、獨裁論潮之際，連蔣自己都對各班委員的存在深感不耐，視為尸位素餐，狀似強自按捺。即使只是在一場中央全會的晚宴上，蔣都「甚感本黨中委之才無政治能力，所以武功雖成，文治退步」。<sup>72</sup>復自記道：「中央委員非老朽即貪汙，不知時機急迫，煩瑣延緩，爭權奪利，令人起亡國之懼。……是皆余自無主宰之所致也。何怨何尤，惟自承當耳。」<sup>73</sup>在中常會上，則又感於常委「仍不知前方敵寇壓境緊急之狀，其從容逸雅，糊塗複雜，燕雀處堂，見之憂悶，悲痛不堪言狀」。<sup>74</sup>甚至：「見黨委，痛苦異常。負此一擔老病幼稚之癩汙，雖有總理，亦被累死，而況中正，能免此無益之犧牲乎。」<sup>75</sup>

然而在表面上，蔣介石仍相當謹慎的維持自己和黨統之所繫的中央委員及委員合議體制之間的行儀，乃至於朝儀的關係。在1932年夏天，基於國難新局的肆應和國家前景的擘畫，蔣日記留下了自己對於新階段

70 這段時期委員制作為一種被詬責的制度，參見：王良卿，〈中國國民黨總裁制度的戰前醞釀與戰時建立〉，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2）：戰時政治與外交》（臺北：國史館，2015年），頁212-217。「文武兼賅、偉大崇高」：李顯廷等廿七人提，「確定救黨救國原則案」（1935年11月），《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館藏號：會5.1/6.12。

71 胡靖安，《目前黨國的幾個基本問題》（南京：作者自印，1932年），頁14。

72 「蔣介石日記」，1932年12月15日。

73 「蔣介石日記」，1933年4月3日。

74 「蔣介石日記」，1933年3月30日。

75 「蔣介石日記」，1933年8月7日。

黨政領導制度改正的若干思考痕跡。總的看來，這些非正式的想法採取的是「權力集中」之義，一旦實現，勢必衝擊委員合議的整體格局。例如在政府體制方面，蔣有意「仿美國總統制」，所謂「必使政權容易集中，以對抗外患，則不能不用總統制以爲應時制宜之計」；<sup>76</sup>在省一級，則考慮改爲省長制。<sup>77</sup>在黨部體制方面，似乎也體現了類似權力集中的思考主軸，例如「黨部自縣以下，改取獨裁負責祕密制」；但是獨獨對於黨中央層級的委員制問題，蔣反而最顧慮其中較爲敏感的政治意味，因此日記一方面寫道「中央仍以委員制」，一方面則尋思在當中新設「一主席爲最後決定之人」以資進行舊制度的新轉化。<sup>78</sup>

國民黨總章裡的「最後決定之權」，指的是總理孫中山（也是總章明定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對於中執會的議決事項，得視情況需要，行使其個人最終之可否態度的一項崇隆特權。<sup>79</sup>孫逝世後，中執會再沒有常設主席，至於中常會、中政會雖有幾次設立主席職位，然亦無「最後決定之權」在握。如果1932年蔣介石以黨「主席」充當「最後決定之人」的設想可以實現，則差可救濟數年來的「空命」之憾，也就未必要去冒進的爭取更爲敏感的「第二個總理」位子。據此，當1934年2月，華北地區一些CC系的黨部委員聯名建議中央恢復總理制，並推戴蔣介石出任而引起輿論界側目的時候，蔣立即「闢黨務總理之謠」、「發表闢總理制謠言」、「發表闢本黨改制謠言」，否認自己打算接管總章裡面早就和孫中山名字緊密連結的此一崇隆職位。<sup>80</sup>

蔣介石面向黨內與公眾而展示了慎謹慎微的個人態度，但另一面併

76 「蔣介石日記」，1932年8月4-5日。

77 「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16日。

78 「蔣介石日記」，1932年6月16日。

79 關於孫中山與最後決定權的對應關係：王良卿，〈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後領導制度的轉型（1923-1924）〉，《國史館館刊》，第44期（2015年6月），頁21-24。

80 「蔣介石日記」，1934年2月28日、3月1日、3月3日；〈恢復總理制的否認〉，《國聞週報》，第11卷第9期（1934年3月5日），頁2。

陳的實情是，他並未付出同等慎謹慎微的努力，去遏制其麾下勢力一再鼓吹黨內改制的相關言行。因此，包括「西南兩機關」在內的反蔣勢力越發的相信，前一年曾經藉由言詞抗爭而成功迫使南京中央展延到本年稍後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仍舊會是擁蔣陣營要替蔣介石的黨內領導地位完成終極法理化的一次反動嘗試。這樣一來，就在南京方面接收了兩廣方面「反對修改總章、恢復總理制」、<sup>81</sup>「蔣氏如堅決獨裁，西南當成一合法機關以為抵抗」<sup>82</sup>之類的警告訊息後，蔣介石不能不再一次正視分離勢力的杯葛行動所可能牽動的負面效應，因此決定再度展延五全大會的召開日程。

及至1935年，日本進指華北的野心日熾，中國救亡圖存的民族情緒達到頂點，人們多將同年11月12日（總理誕辰紀念）終於召開的五全大會，視為國民黨謀求全黨團結、共濟國運的一次令人感奮的政治表現。特別是在蔣介石派員敦洽之下，即使是反蔣最力的兩廣當局也派遣代表入京與會。<sup>83</sup>然而另一方面，舉國鼎沸的民族禦侮聲浪卻也讓許多黨務改制論者覺得「領袖集權」的主張碰到了多年不遇的實踐良機——即使連蔣介石自己，似乎也認為或有試探的空間。日記即顯示，早在全代會舉行前的二、三個月之間，蔣一邊注意儘快謀求和兩廣方面的妥協，曾顧及會前「應一切維持現狀，不可發生變故」；<sup>84</sup>一邊則是繼1932年夏天之後，再次注意到國民黨的「改制」問題，並能保有相當程度的想像，特別是：一、改制之考慮，是與所謂「本人進退與對黨之方鍼」同步醞釀的，換言之，和黨務改制問題直接對位的，就是蔣自陳的「本人」。<sup>85</sup>二、

81 「陳其尤致蔣介石佳電」（1934年9月9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41-062。

82 「戴笠致蔣介石感電」（1934年9月27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002-080200-00441-271。

83 王良卿，《改造的誕生》，頁63。

84 「蔣介石日記」，1935年9月2日。

85 「蔣介石日記」，1935年8月8日。

蔣甚至一度產生「改黨名」的念頭，惟此暫時流於乍閃之靈光罷了。<sup>86</sup>

根據一份不完全統計，在1935年11月召開的五全大會上，至少有十二個黨部、二百七十九人次採用了提案與連署、會外建議案與函電等途徑，促請大會出席代表實現「領袖入制」，其呼請之激切，尤勝於去年籌開大會期間。然而兩廣代表反彈之烈，超乎想像。<sup>87</sup>其實「團結」兩廣，本來就是五全大會必欲顧全的政略思考。會前，蔣介石既有「謙忍虛心」以試求「本黨復合」、<sup>88</sup>「慎之又慎」以成就「大會之團結旨趣」之想；<sup>89</sup>會前會中，復又積極考慮擴充新一屆中央委員名額，給予兩廣方面若干比例的保障，欲以形式之名位兼容各方現實之利益（儘管這又繼續坐實了人們對於委員名器過於浮濫的負面印象）。<sup>90</sup>等到目睹改制問題在會中、幕後所遭阻力之大，則只有心生「羞辱」、「可痛」、「苦痛」的難堪感受。例如11月17日，自記：「黨員自私與患失之心理以及『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觀念不除，一有改革即畏懼嫉妒，可痛也乎。」至此，已有「領袖問題不准提出」的對應準備。及至19日，粵方主張賦予大會主席團關於圈定中委人選若干名額的權利，惟又立刻遭到其他代表的嚴厲反對，抨擊為越權之舉。<sup>91</sup>本日，蔣記道：「對外非難，對內為難，而對黨為更難……。」20日，粵方孫科宣稱辭卸主席團身分，以抗議未能取得圈定權利，接著全體主席團成員也打算跟進。就在大會橫生波瀾，兩廣代表更聲言不惜退席以杯葛「領袖入制」的總章修正案後，蔣用忍戒急，親自給改制風潮踩了煞車。<sup>92</sup>茲列舉其自誌之心境數則。21

86 「蔣介石日記」，1935年10月23日。

87 詳見：王良卿，〈中國國民黨總裁制度的戰前醞釀與戰時建立〉，收入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2）：戰時政治與外交》，頁225。

88 「蔣介石日記」，1935年10月反省錄。

89 「蔣介石日記」，1935年11月9日。

90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2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507-508、510，1935年11月14日、11月16日、11月18日。

91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2冊，頁512，1935年11月19日。

92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2冊，頁512-514，1935年11月20日、11月22日；「蔣介石日記」，

日：「余誠信未孚乎。」22日：「難堪與其所受之痛……爲甚也。」24日：「輕視目前羞辱，忍住十字架苦痛，耐心直向上帝所指示的正路。」

根據蔣介石的評估，自己的退讓態度已經成功換取了五全大會「如此完滿之結果」，甚至不失樂觀的認爲「實開黨國未有之新紀元」。儘管他也知道自己「對內合作之政策」還沒有真正達到全黨「精誠團結」的程度，但似乎也相信「形式上已達到瓦全之目的」。<sup>93</sup>很快的，蔣顧念「形式瓦全」的心理，就又化爲某種帶有彌縫意味的政治動作，反映在五屆中執會初期的高層人事上。溯及五全大會閉幕當天，蔣介石已考慮把「政會與常會設主席」定爲一中全會的應辦議案。<sup>94</sup>其後一個星期內，決意推舉胡漢民爲中常會主席，爲的是配合提議取消「西南非法兩機關」，希望以某種人事的補償手段「安定兩廣」；另決定以汪精衛爲中政會主席，「余兼任兩副主席」，「以爲本黨復合之張本」，並自記：「在他人視之，必以余降尊就屈、委屈其全爲大難，而此實爲應勢順時、一定不易之常理，非此不能救國，更無以安內。」<sup>95</sup>顯然蔣介石如同既往，以「尊」自視之餘，仍可依「勢」、依「時」而權宜「降」、權宜「屈」。只是廣州方面並不領情，以致他顧念「瓦全」的心願只能真的停留在「形式上」。根據蔣日記：在中央「眾言紛雜」的會議中，鄒魯捍衛西南兩機關的存在最是不遺餘力，其言行態度之不滿南京，只有讓蔣滋生「黨國不幸，竟至於此」之想。<sup>96</sup>悲嘆之餘，蔣想到以往西山會議派如鄒魯者「爲共黨排擠、生無立足之地」的一頁痛史，自問：「不知本黨之有今日、彼輩享受榮華者，此恩此德是何人所賜，而反面噬人矣。」最後，這位自認布德

1935年11月21日。

93 「蔣介石日記」，1935年11月反省錄。

94 「蔣介石日記」，1935年11月22日。

95 「蔣介石日記」，1935年11月27日、下週預定表（11月30日後）、12月2日、12月3日。

96 「蔣介石日記」，1935年12月3日、12月5日。

施惠而未得果報的恩賜者甚至難掩情緒：「此黨不滅，焉能救國。」<sup>97</sup>

## 五、「對總裁責任應當仁不辭」：臨全大會再啓領袖制度

1936年2月，蔣介石在日記「雪恥」欄目寫下：「天命者凡非『人爲』而出於『自然』，且此『自然』皆合乎常理與人性，即謂之天命。」<sup>98</sup>話說得極簡，但已可見到蔣介石從「空命」尋往「天命」的挫折經驗當中，已能深諳「人爲」之餘，尚須等待時移勢轉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這一年，並未就任中常會主席的胡漢民猝逝於廣州，這件事連同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不僅顯示了四年多來西南兩機關半獨立狀態的終結，同時也讓蔣介石在爭取黨國統治合法性的漫長道路中，擺脫了一位饒具革命聲望、恆以捍衛黨權自命的異議派主角所投注的多年牽制。接著，南京中央掀起「蔣公五秩壽辰」祝頌活動的廣泛動員，以及西安事變和平落幕後全國輿論轉爲快慰的集體情緒，似乎也都說明了：當被治者開始能把蔣的「人身生命」與「國族命脈」畫上休戚相關的認知等號之時，蔣做爲黨國體制唯一領袖的地位自然水到渠成。<sup>99</sup>

在「一國三公」已折其一的局面下，蔣介石最需面對的，仍是汪精衛。1937年1月，汪自歐洲經新加坡返國，重新回到中國公眾的視線。蔣介石延續了「降尊就屈」的思維邏輯，在寧波、溪口親迓汪氏來訪之前，已起意推舉這位久違的黨國要角擔任中常會主席。<sup>100</sup>兩人討論到黨務與經濟問題。根據蔣所記錄的談後印象，汪有志於經濟，但蔣認爲此非「汪先生」的專長，要辦，「必被人欺」。<sup>101</sup>接著，在2月的五屆三中全

97 「蔣介石日記」，1935年12月5日。

98 「蔣介石日記」，1936年2月12日。

99 詳見王良卿《改造的誕生》的討論，頁69-71。

100 「蔣介石日記」，1937年1月19日、1月25日。

101 「蔣介石日記」，1937年2月1日。

會幕後，蔣「爲推汪任常會主席事甚費周折」，<sup>102</sup>據說主要的障礙來自居正、張繼等西山會議派的反對，蔣再嘆道：「老派自尊，不識大體，祇有搗亂，可痛也。」<sup>103</sup>其實1932年「蔣汪合作」以後的國民黨黨務，基本上已經不是汪精衛及其改組派舊人能夠繼續一爭雄長的場域；<sup>104</sup>在一批黨務菁英的政治計算中，中常會的決策功能不彰，以致開會多往中政會奔競，更導致常會時有「寥寥」之感，不無「隨時拉夫」情事；<sup>105</sup>至於所謂的常會主席職位，同樣缺少制度面權力的實質支撐。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乍起，掀起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的序幕。在這場民族戰爭明顯走向全面化、擴大化、長期化發展的趨勢下，國家權力面臨到集中化的需要，特別是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權」與「位」如何進行填實，乃至給予法理化的對應，自然也就成爲南京當局連鎖配套的一個重要環節。先是戰前，蔣介石構思「對共方針」而欲組成國共合作性質的「國民革命同盟會」，其主觀之設想，頗爲注意自己的「領袖地位與權責」，明白說來，就是必須握有蔣在國民黨內尚未擁有的「領袖最後決定權」。<sup>106</sup>及至8月，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決議設置「國防最高會議」，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主席，蔣介石依此身分節制「黨政軍一切事項」，可「以命令爲便宜之措施」，並獲得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授予其「最後決定權」。<sup>107</sup>到武漢後，蔣介石也曾向各黨派領袖表達「化多黨爲一黨」的合作願望，其中同樣注意以蔣自己做爲指涉對象的「最高領

---

102 「蔣介石日記」，1937年2月19日。

103 「蔣介石日記」，1937年2月20日。

104 參見：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1冊，頁383，1933年6月15日；「汪兆銘致葉楚傖電稿」（1938年2月7日），〈汪兆銘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各項函電（二）〉，《汪兆銘史料》，國史館藏，數位典藏號：118-010100-0006-027；陳公博，〈改組派的史實〉，收入陳公博，《寒風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4年），頁甲282。

105 王子壯，《王子壯日記》，第2冊，頁6、63，1934年1月11日、5月4日。

106 「蔣介石日記」，1937年5月17日、5月反省錄。

107 參見劉維開的討論：〈戰時黨派合作的開端——國防參議會研究〉，收入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國史館，1998年），頁140。

袖之責任與權限」、「推定全國各社團最高領袖，確定其負責領導與特許及干涉取締之大權」。<sup>108</sup>

1938年2月3日，國民黨中常會決議定期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籌謀戰時黨政興革諸端。<sup>109</sup>事實上，這時在國民黨中央的幕後，已將推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一事，納為臨全大會的主要任務了。24日起，四天之內，蔣介石日記共有三次帶入「黨務改制」等相關字句，考慮「黨制宜積極剛強」。<sup>110</sup>3月11日，蔣介石首次將「黨改領袖制」字句寫入日記，並和汪精衛就大會相關提案進行協商，然而汪的反應欠佳，表示不願再有黨魁的意思，從而形成了蔣的困擾。<sup>111</sup>這樣一來，在全代會開幕前的兩、三個星期內，蔣持續思考「領袖問題」、「總裁制」問題，甚至自記了一條令人費解的預定事項：「各省市以下黨部賦與青年團團長指揮監督及改組之全權」云云，極有可能就是考慮到本次「黨改領袖制」萬一受阻後，仍可利用新設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長身分做為從權達變的備案。<sup>112</sup>最後，就在全代會開幕前四天，蔣介石自記預定事項，終於確立了「對黨不辭領袖」、「推汪為副」等具體原則。<sup>113</sup>前者表示了願意擔負仔肩的決心，後者應是安撫汪精衛的最後一著，惟汪在會前未必得悉。<sup>114</sup>

年初，日本近衛內閣以國民政府缺乏和平誠意為由，發表聲明，宣稱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3月28日，日本扶植「維新政府」於南

108 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下卷（香港：明報月刊社，1982年），頁436；「蔣介石日記」，1938年1月30日、3月11日、3月12日、雜錄（3月12日）。

109 「第六十六次會議」（1938年2月3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會議紀錄彙編（上）》（臺北：中央委員會秘書處，1935年），頁184。

110 「蔣介石日記」，1938年2月24-25日、2月27日。

111 「蔣介石日記」，1938年3月11日。

112 「蔣介石日記」，1938年3月15日、3月18日、3月21日。

113 「蔣介石日記」，1938年3月25日。

114 果然如此，則可進一步解釋汪精衛後來在臨全大會採取包裹方式而同時推舉蔣汪分任正副總裁時，臉色至為不佳的部分原因。又，一般認為，臨全大會採取包裹式推舉，是為避免汪的副總裁不通過；不過，如果考慮到會前汪已表示不願再有黨魁的意思，恐怕這次大會也只有透過包裹的方式，才可消解蔣的總裁任命所可能遭遇的阻力（至少，才可緩解蔣的疑慮）。

京成立。就在翌日，國民黨臨全大會揭幕。在會中，蔣介石無疑是把黨務「天命」藉由改制行動的重大託付，看成是自己領導中國最具有合法性的完美證明，自記：「雪恥：此時設立總裁，至少可表示本黨不妥協之決心，與敵以精神上之打擊。」<sup>115</sup>又稱：「對總裁責任應當仁不辭，以救國與對外之道已無他法，此為最後一著，實與抗戰增加實力不少。而且確定黨國重心，無異與敵精神與其策略上一大打擊也。」<sup>116</sup>大會閉幕後，蔣介石撫今追昔，或許百感交集，自認「為黨國奮鬥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幾乎相信國民黨自容共改組以降十五年「飄搖之黨基」，至今終可得到穩定。在這一年日記本的「雜錄」頁面上，蔣自誌欣慰之餘，最後不禁問道：「其為不幸中之幸乎。」<sup>117</sup>

## 六、結論

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政治中，軍人當國並不需要面對一個更上層的權力結構，但在國民黨改組後，志在青雲的蔣介石，連同黨內其他「武裝同志」，勢必需要學習面對一個主張「以黨領軍」的黨機器的節制。嚴格說來，中山艦事件與二屆二中全會可以算是蔣過問、乃至操持黨務的生涯起點，但經此轉折，蔣卻也無可避免的將自己推到了人們質疑「以軍問黨」的火線前列。從中山艦事件到北伐完成後，蔣的權力「跨界（transboundary）」越來越廣，也越來越深，對後孫時局這樣一位快速崛升的上層軍人而言，怎麼去對應一個列寧式政黨的特殊治理話語，以便消滅黨內同志有關「槍指揮黨」、「武主文從」的聯想或指控，隱然也就成了揮之不去的困擾。例如蔣一度以「軍人模範」而思考個人進退，即令

115 「蔣介石日記」，1938年3月29日。

116 「蔣介石日記」，1938年4月1日。

117 「蔣介石日記」，雜錄（1938年4月3日、5月1日）。

出諸情緒，總能說明文武主從情結對其纏磨之深。

蔣介石的黨事支配，經常帶有合法性不足的警覺，部分原因還跟他身為黨內後進而又要面對委員合議制度的形式，以及元老的環伺、羈絆所混合形構的複雜政治格局有關。孫中山逝世後，其在國民黨總章所享的崇高權位隨之高懸，黨務支配的合法性（黨統）正式落在一個委員合議的格局（而非個人）裡頭進行塑造，再加上觀察者所說的黨內元老「彷彿一種道德的存在」，使得蔣以「後進之姿」的「以軍問黨」，經常在權力倫理上對於一批老者多有瞻顧，在權力體制上則是還需適應委員合議制度「一國三公」般的形式化制約。究其實際，蔣之念茲在茲者，仍是怎麼設法超克這些備極困擾的課題，以便把他的權力之「實」與尚待證成的「名」聯繫起來，期能充分縮攝全黨。其實在國民革命運動取得中國的執政局面後，有人開始以「中國的凱末爾」期待同是軍人的蔣介石，望其衝決舊緒，領導「黨國」未竟的革命事業；但在權力的立足基礎上，誠如論者的品評，蔣全無凱末爾那樣的崇高威望。<sup>118</sup>同在1920年代，俄共史達林進取全黨的時間點也和蔣介石相去不遠，同樣被動捲入、甚至主動催化了黨內第一代強人逝世而衍生的政治複雜動態，但蔣在權力激烈競合的同時，仍須設法從「文主武從」的治黨邏輯中解困，這和史達林一開始就站在黨的中央總書記的制高位置上遠遠不同的。

這種名實不符的景況到了1930年代前期產生了重要變化。除了個別得到信任的角色外，做為元老派集體意象表徵的「商山四皓」不再動輒得到蔣介石的垂聽、請益了；蔣日記對於黨統之所寄的一班中央委員，更有老朽無能、貪汙爭權等等的不耐語，其情緒溢於字裡行間，不稍假飾。此外，蔣也延續了武力和羈縻的雙重策略，伺機一一消納黨內的軍事反側力量；黨內頗富組織、宣傳能量的改組派人馬，經由南京中央的

118 楊奎松，〈直面中國的革命〉，收入楊奎松，《楊奎松著作集：革命·壹》（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不斷壓制，乃至「蔣汪合作」的實現而進入國民政府體制，也已經消退了原本在地方黨部可觀的影響力。另一方面，蔣介石經歷生平第二次下野的教訓後，開始透過「派系替代」策略，將國民黨的人事基盤改向自己而進行嶄新的翻轉，重新劃定了國民黨的派系版圖。爾後，幾支迅速膨脹的擁蔣勢力（主要指黃埔系學生主導的「力行社體系」、CC系成員支配的「青白團體系」），一直戮力實踐著蔣集「幹部、組織、情報」三位一體的權力資本哲學。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年代，擁蔣陣營也因勢利便的托庇了舉國救亡圖存的集體意識，積極營造公共輿論，鼓吹黨與國的領袖獨裁統治，並試圖挑戰前述幾個橫梗在蔣權力階前的焦慮因素：一、面對冷峻的民族危機、黨勢頹唐的現實，以往「軍人」掌權、「個人集權（甚至獨裁）」的負面意涵，均被著意翻轉成復興國族、挽救黨基的正面價值想像。二、相對的，行之有年的委員合議制度則是蒙受了更大程度的批判力道。整體而言，它淪爲了包括領袖獨裁論者在內不少人士口誅筆伐的對象，指爲決策效能低落、責任不明，甚至是導致政治分裂的制度性元凶。

至於蔣介石自己的想法也有同步發展之處。在國難當頭、各界促請政府制定憲法並結束訓政的年代中，蔣同樣秉持「權力集中」的思考主軸，摸索國家和地方政制的可能前景，例如中央層級的「美國總統制」、地方的「省長制」，也包括縣級黨部以下的「獨裁負責祕密制」。惟獨對於黨中央的委員合議制度，仍顧慮其政治象徵意義，勉予維持之際，而有添置「一主席爲最後決定之人」以資救濟的想像。換言之，蔣相信爭取總理特有的「最後決定權」（而非貿然立刻接收「總理」的崇隆名位），才是可以真正凌駕於委員合議體制之上的制度化保證。據此，當擁蔣陣營在1935年的五全大會掀起新一波輿論，要求立即實現黨的領袖集權，必欲造出第一個總裁，甚至第二個總理時，蔣在幕後還是表達了自己可在委員合議體制之中，扮演一個可能擁有最後決定權的主席的意向。不

過，全大會一開始設定的「團結」基調，加上兩廣代表依然強烈反對大會通過任何形式的「領袖入制」變革，在在注定了最後蔣的謹慎以對，不敢冒大會破局的風險，從而幾乎是以一位大會代表、中央執行委員以及眾人擁立的當事者的混合姿態，建議五全大會不必修改總章，暫時撤回了親善勢力的加冕願望。

五全大會閉幕兩個多月後，蔣介石日記提到「天命」出諸「自然」而非「人爲」，似是對於多年衝決名實未果的省察與感慨。事實上，論者早已指出1936年幾個重要事件與蔣的威望再提升，乃至領袖地位「定於一」的正向連結關係；無可否認的，當中既有聽候「自然」遞嬗、等待時移勢轉的成分，當然也能見到「人爲」繼續鋪陳的苦鬥、動員痕跡。及至1937年抗戰軍興，配合戰時國家權力集中化的需要，如何把蔣在國民黨內的權力給予「名」和「實」的法理化聯繫，自必成爲南京當局整體思考的重要環節；特別在1938年初，日本近衛內閣聲明「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蔣加緊思考了如何建構自己縮攝全黨、團結各黨的「最高領袖」身分，看成是給予敵人最有力的打擊。就在戰爭初期特殊局勢的交揉之下，3、4月之交，蔣終於接受了國民黨臨全大會賦予的「總裁」榮銜，也以「代行」的名目接收了懸置多年的總理職權。蔣介石成爲總裁，回想國民黨改組以後的動盪歷史，當下流露的欣慰情緒大概是人們很難想像的。他曾經相信，自己獲得人所共認的「黨國重心」地位，既是全黨認可其革命履歷的完美證明，也是終結黨基動搖經年的可靠保證。其實蔣的論斷未必契合來日史實，但終究反照了他之爭取黨務支配的合法性，其心境自剖，何等感慨係之。